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

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

ZHONGGUO DE JIDUJIAO WUTUOBANG YANJIU
YI MINGUO SHIQI YESU JIATING WEILI

陶飞亚◎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

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

ZHONGGUO DE JIDU JIAO WUTUOBANG YANJIU
YI MINGUO SHIQI JESU JIATING WEILI

陶飞亚◎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兆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陶飞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 978-7-01-010999-2

I. ①中… II. ①陶… III. ①基督教-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民国 IV. ①B978 ②K25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1183 号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

ZHONGGUO DE JIDUJIAO WUTUOBANG YANJIU

——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

陶飞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15 千字

ISBN 978-7-01-010999-2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基督教研究的兴趣日浓,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基督教。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近年亦发现有不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的转移(Shift of Paradigm)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如柯文(Paul Cohen)等提出了新的研究典范的转向(Paradigm Shift),即是从“西方中心”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典范。^①过去的研究多是从宣教史的角度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所关注的问题是传教士怎样将福音传遍中国,以及如何使中国“基督教化”。“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典范则强调须以中国为主体,并将中国基督教史放回中国的历史社会处境中研究。但由于西方学者们所采用的资料多是来自西方,即大部分是留存在外国的西方传教士或差会的档案资料,他们的议题也自然地是从西方取材,仍然不能摆脱那些属于西方、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议程。因此,真正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典范,还应该留待学者们去寻索“中国方面的资料”,找回“中国的议程”,并且重新寻觅“中国人(包括中国信徒)的看法”。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档案资料逐步开放,内地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者可以更方便地接触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过去由于国外的资料——尤其是欧美文字的资料多是由传教士留存下来的,有关的文献也多是传教士或是差会的角度做的记录,因此研究者难免会受到传

^①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教士观点及看法的局限。这些重新开放的中国资料正好可以补充外国资料的不足,有助于学者重新发现传教士以外的另类观点与看法。不过,有些学者初时往往难于摆脱教条式的立场,片面地将基督宗教在华的活动视为“西方的文化侵略的工具”。为此,学者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揭发传教士的“阴谋”,或是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诠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包括他们的宣教与教育活动。^①

1989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许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新开端。章开沅教授当时曾指出:“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章教授即建议学者们可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的基督教。这当然不只是关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也不只是限于基督教大学的活动吧。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亦多从较正面的角度及较积极的态度看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虽然他们的研究仍是集中在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比如何晓夏、史静寰合撰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③和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④明显地,学者们已真正转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典范上。他们也不单是参考利用中国的档案资料,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属于中国议程的问题,比如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观察基督教问题。

不过,若从研究角度看,这些学者所关注的只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流动,即“西学东渐”的结果,比如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是如

① 例如,顾长声先生早年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1年再版。

② 参见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 参见何晓夏、史静寰合著《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参见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何带来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等。他们仍然忽略了中西文化交流亦会对西方的基督教产生影响。基督教来华的传教活动不仅是将西方文化带进中国来,它也必然地产生另一个方向的交流,即“东学西渐”的结果。正如季羨林教授在主编《东学西渐》丛书时指出,文化交流必须是有“拿来”、也有“送出”,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化交流”。^①唯有从这种双向的角度去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才可以较全面地、透彻地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叶后亦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如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一书中指出:“耶稣会士来华把西方的宗教、科学传授给中国,同时写回欧洲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使西方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②这正说明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单如此,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也有不少因与中国人的接触而被改变了的。较突出的研究是连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传教士的改变——在华美国新教差会中的自由主义”^③。论文清楚地描述了几位西方传教士来华接触中国宗教和文化后,如何将他们对自身来华宣教的想法逐渐改变过来。他们本想改变中国,至终却被中国改变了。^④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冲击与反应”(Impact-Response)的研究典范。^⑤无疑地,西方的基督教教育对近代中国来说是一种冲击,必然引起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反应。反过来说,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处境也可以是对西方基督教教育的一种冲击,西方传教士也必须对中国的冲击作

① 参见季羨林之《东学西渐》丛书总序,载于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书,前言,第1—3页。

③ 参见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the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连博士专门研究三位传教士在中国的转变,即胡美(Edward H. Hume)、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和赛珍珠(Pearl S. Buck)三人。

⑤ 参见 John K. Fairbank and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出適切反应。因此,这种“冲击与反应”也必然是双向的。^①

由是观之,要认真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这样才可获致一个较全面、也较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来。在此,我也提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即中国基督教并不单纯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而已,它也应包括那些属于中国,或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若再以中国基督教大学为例,我也曾提过:“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品,中国基督教大学不应只被视为是纯属于西方的东西,它也蕴藏着不少中国的元素。这些中国的元素也是不断在增加中。”^②这所指的就是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华人信徒——包括校长、教授和学生这方面的中国元素。事实上,在重新发掘中国人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亦不能只看到中国基督教圈外的“反帝、反文化侵略”的立论。在中国基督教史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即过去一直被学者忽视的“华人信徒”的看法。“华人信徒”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形而上思维的选取。“华人信徒”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也是一班有真实信仰体验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去问:究竟“华人信徒”是怎样选择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的?在选择宗教信仰时,他们是如何同时拥抱着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他们是怎样从中国人的角度诠释基督教信仰(创造本色化的神学)的?又是怎样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的问题(确定中国的议程)的?这些都是十分具体、实在的问题(像选择穿唐装或西装衣服一样)。若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基督教(或者是中国基督教教育)事实上也可算是一种中外合作的结晶品。^③

陶飞亚博士的研究正是我们多年来所期望的。他研究的材料不单是大部分来自中国方面的资料,更是以中国信徒为其研究的对象。他

① 读者亦可参阅拙书:Ng, Peter Tze Ming,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1950*.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p. 36.

② 参见吴梓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个案:中国基督教大学》,2002年10月上海大学研讨会上宣读之论文。

③ 参见吴梓明《基督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亦尝试从中国信徒身上重新发掘中国的议程,深入探究中国信徒是怎样理解中国的社会及处境问题,怎样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怎样从中国人的角度诠释基督教信仰,将基督教变成为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

近代西方学者亦有提出类似的看法,如裴士丹(Daniel H. Bays)教授在他的书中亦指出“华人信徒研究”可以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重新寻找一个属于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发展史来。^①其后,鲁珍晞教授(Prof. Jessie Lutz)在一个研讨会上亦大胆提出她的构思,即要尝试以中国基督徒为主体,重新划定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分期。^②事实上,在中国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华中大学的韦卓民教授已经提出了必须要以中国基督教为本位的看法,他所强调的正是:“要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力”,就必须“让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成长”。^③王治心在讨论中国本色教会时,也曾用过一个比方——他以“落花生”的比喻生动描述了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运动。“花生”在中国本是称为“洋花生”,因为它是从外国进口的。但经年累月后,花生已可以在中国的土壤里培养和栽植,即吸收了中国的滋养料而成为了中国本土培植的花生了。^④同样的,如果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中国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内,成为中国人生活实践与流露生命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它也自然地成为了一种完

① 参见 Daniel Bays(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参见 Jessie Lutz, “China and Protestantis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Wu Xiaoxin & Stephen Uhalley (eds.), *Christianity and China: 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读者亦可参阅拙文的有关讨论, Ng, Peter Tze Ming, “Paradigm Shift and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the Stud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12 (2001), pp. 127-140。

③ 参见韦卓民《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力》(Making Christianity Live in China),《中国纪事报》(*Chinese Recorder*), 1926年2月;及《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协和神学院评论》, 1945年10月。

④ 参见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 1925年1月第79册, 第11—16页。

全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来。^①若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运动,并不一定如有些学者所说:“它必然是具有强烈的宣教关怀的。”^②相反,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也可算是中西文化在中国相互交流、合作下的一种自然结果。^③陶飞亚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群体——耶稣家庭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是敬奠瀛,他是山东泰安马庄敬家杭人。敬奠瀛出身于农民家庭,初时接触了美国传教士,后来他独自创立了耶稣家庭,渗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及传统文化元素,更是配合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需要,发展了一种近乎共产主义式的宗教社群,成为了一个具有十足中国本色的基督教群体。^④耶稣家庭教会虽然是借用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观念,但它确亦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文化、生活经验去理解基督教的信仰,并且是将圣经的教训结合在中国的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产品。其中有三个特点是值得留意的:(一)耶稣家庭强调家长制,由一家之主安排一切家内事务,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二)耶稣家庭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时也是实行土地财产公有,一度非常兴盛,但只是延续了30年左右的时间,便在内外交困中消亡了;(三)耶稣家庭所用的诗歌,大部分是由境内或山东省附近地区的民间歌谣,配合耶稣家庭的信仰,也充分地表达着中国人的一份宗教情怀。耶稣家庭在中国虽然只活跃了30多年,但它在表达中国人对集体公有、平等平均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方面却有深刻的意义。本书用

① 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运动并不一定是有强烈的宣教目的,若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基督教中国化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必然结果。读者亦可参阅拙文《韦卓民博士眼中的基督教及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刊于马敏等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8页。

② 参见吴利明《从文化层面探讨本色化的问题》,载于《文艺》1982年第3期,第13页。

③ 参见韦卓民《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力》,《中国纪事报》,1926年2月。

④ 本色化神学也并不一定是局限于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耶稣家庭的本色化便是渗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与文化的元素。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来概括耶稣家庭运动,看出了这场运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作者很有见识之处。实际上,这也是下层基督徒使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一种努力,就像上层精英赵紫宸、吴雷川等尝试用不同模式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努力一样,尽管他们的道路都没有走通,但他们的事业和经历已经成为昭示后人的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给我们描绘了长期被忽视的草根基督徒在底层社会的生活,这无论对基督教史还是对广义的历史研究都是一种贡献。

我有缘初识作者是在1991年6月。当时我们共同参加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他那时还是山东大学的教师,正在做有关齐鲁大学(原山东基督教大学)的研究。因为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从此交往渐多。1993年12月,我邀他参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但因他在美国北卡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从事短期研究,提交了论文但未能赴会。1994年5月,他返国后我应邀访问山东大学,了解齐鲁大学的资料情况,并同他讨论以“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为题进行合作研究。前后三年完成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第一辑《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由于合作关系,我亦协助他申请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资助,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研究。在中大数月,他很喜欢中大的环境,尤其是这里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处独有的学术研究气氛,以及常有向来访的国内外知名学者请教、参与一流水平的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因此,他决定申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进修。终在1998年年初,他开始修读宗教及神学部的博士学位课程,专修范围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陶飞亚是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内地学生中第一位选读“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生,我有幸成了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能与他一同见证这篇博士论文的撰写历程。在此期间,他虚心求教,勤奋尽责,除了下工夫发掘资料外,还努力探讨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古今中外乌托邦个案的比较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足见他是一位能认真做研究

的人,颇得老师们好评。我亦高兴能与他亦师亦友,饭前课后,坐而论道,不亦乐乎!飞亚三年内修完所有博士课程并创作了这篇在答辩中被中外专家评为优等甲级的博士论文。论文随即获宗教系老师们及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推荐,参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奖”遴选。作为他的论文导师,我自然感到光荣。

今更喜见其论文荣获香港中文大学 2001 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付印出版,俾得更多读者赐正,故欣甚为之序。

吴梓明

2003 年 8 月 13 日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办公室

Preface

Daniel H. Bay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Asian Studies Program, Calvin College, USA;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University of Kansas, USA.

It is my pleasure and honor to inscribe a preface for this outstanding book written by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Professor Tao Feiya of Shanghai University. A revision of Professor Tao's excellent dissertation a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work, *A Christian Utopia in China: The Jesus Family (1921—1952)*, is one of the very first historical works from China which analyzes deeply both the context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the history of indigenous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I believe that in future it will be viewed as a landmark volume, pointing the way towards the more objectiv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noteworthy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One is the very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of Shandong province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vided by Professor Tao. Drawing partly on his earlier fin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Shandong society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Liu Tianlu, he shows convincingly how this context con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Jesus Family's formation. Tao's description of the movement's founder, Jing Dianying, is equally insightful. He paints a very understandable picture of this fascinating religious visionary, who in some ways can perhaps be compared with Hong Xiuquan.

One of the 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study is how it deals objectively with both foreign missionary and nativ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makeup of the Jesus Family. For example, Tao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ers such as Nora Dillenbeck and L. M. Anglin in shaping Jing Dianying's faith, but he portrays the Jesus Family as a thoroughly Chinese movement. I agree. For most of its life the Jesus Family had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other commendable aspect of this study is its 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and disbanding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at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entire study is nicely situat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 cross-cultural discussion of utopias as broader historical phenomena.

Finally, I admire Professor Tao's work because it really is a path-breaking study. In most aspects of this research and writing, Professor Tao by necessity has had to function as a pioneer. No one has previously done a comparabl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centered on Christianit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viewing it as a Chinese, not a foreign, phenomenon. Moreover, Professor Tao based much of this work on a large collection of unique and diverse documents painstakingly gathered from local archives in Shandong, supplemented by interviews (some of them hard to obtain) with many participants. His use of these archival and oral history materials is exemplary, and indicates the work of a mature scholar. But it took a great deal of very hard work to do it. I know this because of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Professor Tao during the years we were working on related topics, when we shared both materials and ideas.

Finally, this book is also well organized and clearly written. I believe that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alike will enjoy and profit from it. I am proud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de a small contribution to support of this study, and I am very pleased to recommend this work enthusiastically to my colleagu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Grand Rapids, Michigan, USA

30 September 2003

目 录

序 言	吴梓明 (1)
Preface	<i>Daniel H. Bays</i> (1)
导 言	(1)
第一章 乌托邦思想的跨文化考察	(7)
一、基督教与乌托邦	(8)
二、教派与乌托邦实践	(11)
三、中国传统中的“大同”思想	(13)
四、近代乌托邦主义的新趋向	(18)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泰安社会与基督教会	(23)
一、马庄——耶稣家庭的发源地	(23)
二、民国初年泰安的社会变动	(27)
三、基督教在泰安的发展和影响	(36)
第三章 敬奠瀛与耶稣家庭的起源	(56)
一、早年坎坷与求仙访道	(56)
二、从反对基督教到走上传道生涯	(62)
三、圣徒信用储蓄社:基督教乌托邦的起点	(71)
四、接受灵恩:与老教会决裂	(79)
五、从蚕桑学道房到耶稣家庭	(87)
第四章 奠基的十年	(94)
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宗教复兴与农村 改良活动	(94)

二、最初的传教活动与小家的发展	(103)
三、经济问题与老家的发展	(116)
四、林美丽加入耶稣家庭的影响	(123)
第五章 走向兴盛的乌托邦	(130)
一、抗战时期的泰安时局	(130)
二、家庭的发展:危机推动信仰	(135)
三、新经济措施的产生	(144)
四、理想的处境化与宗教宣传	(157)
五、权力结构:家长制的建立	(174)
六、理想与现实:“方舟”中的生活	(183)
第六章 徘徊与挑战	(196)
一、内战时局与家庭的发展	(196)
二、新措施:激进与现实	(202)
三、宗教思想和宣传的发展	(207)
四、集体经济和集体生活	(215)
五、裂痕:内部矛盾的发展	(228)
六、政治问题	(242)
第七章 中国基督教乌托邦的终结	(248)
一、最后的发展	(248)
二、赞美乌托邦:乡村派发现耶稣家庭	(251)
三、家庭新取向:宗教迎合政治	(261)
四、困境与内部的改革	(276)
五、革新:“促其自行结束”	(292)
六、尾声:“革新”以后的北新庄教会	(310)
第八章 中西基督教乌托邦的简要比较	(316)
 附录 1 英国 19 世纪以来的主要基督教乌托邦	(327)
附录 2 美国 18 世纪以来主要基督教教派乌托邦社团	(329)
附录 3 美国世俗乌托邦团体	(333)

参考资料与书目	(334)
后 记	(350)
致 谢	(353)